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周口红色记忆

出生入死二十载 身处逆境终无怨

——追记扶沟县隐蔽战线老战士杜建超

□刘战西

(上接9月18日7版)

杜建超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经族兄杜振介绍，来到禹县城南50里的黄岗店的伪税务所谋职。这里与郑县、襄县接壤，盛产烟叶。因烟叶利润比较高，禹县伪政府在此开设税务所，以收取烟叶税为主。同时，这里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非常有利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杜建超来到此处，就住在新民烟草行里。

因这里种植烟叶，相较于豫东的扶沟、西华等地，比较富裕。因此，此地的地主、豪绅多有家丁看家护院，且民间枪支较多。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杜建超重点是发展党的地下武装。他利用公开的身份，经常到当地的大户家里了解情况，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过一段时间，他就回到许昌县城，向地下许昌县委书记彭国正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发展壮大党的地下武装，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武器短缺问题。杜建超利用公开的身份，主动与商人、地主、土豪联系，想方设法从这些人手中搞到枪支弹药。杜建超通过与驻禹县国民党保安团副团长石耀武多次接触，两个人渐渐熟络起来。了解到石耀武家中存放有几把手枪后，杜建超瞅准时机，将这些手枪弄了出来。驻禹县国民党29军一宋姓便衣队长，经常出入风月场所。一天，杜建超发现此人又进入禹县的一个青楼，便尾随其后以待时机。不一会儿，杜建超便将宋随身携带的20响驳壳枪弄了出来。在伪税务所任职期间，杜建超经常走村串户，与烟农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把一批思想坚定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杜建超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地下武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批人被编入豫西我军地方部队。

1945年春，许昌、襄县、禹县相继被日军占领。在许昌被占领前的一天，上级党组织找到杜建超，让其尽快到许昌北大街于家胡同参加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让杜建超随伪河

南教育馆向南阳迁移，以便保存力量。

搞武器 做策反 为全国解放战斗不止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从此，中国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三年解放战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杜建超又回到了许昌。

此时，河南伪保安处的肖洒从西安胡宗南处回到许昌，成立了豫中联络处，自任主任，并开始招兵买马。为了从肖洒那里搞到较多情报，杜建超趁此机会，打入伪联络处内部。通过杜振的关系，杜建超当上了豫中联络处的上尉副官。

此次打入伪联络处内部，杜建超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敌伪人员，同时想方设法搞到我党地下武装急需的武器弹药。杜建超利用公开的身份，接触到了曾跟随日军的翻译官黄光武。一段时间后，黄光武被成功策反。趁着日军投降这个空隙，黄光武从溃败的日军手中购买了长短枪10多支，各类子弹3000多发。杜建超利用联络处副官的身份从伪治安人员私人武装手中购买枪支弹药。短短几个月时间，杜建超就筹集到机枪、步枪、手枪100多支，子弹10多箱。

独闯龙潭虎穴 解放战争中建奇功

1947年，全国进入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解放区采取重点进攻。经过一年的苦战，国共两党的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

1947年底，许昌解放。受中央社会部北方局指派，杜建超南下武汉，主要任务仍然是策反敌人，收集情报，为解放中南地区做准备。在伪联络处期间，杜建超与另一位副官邢之杰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当然，邢之杰并不知道杜建超的真实身份。一天，杜向邢说想在肖这里了，想去武汉发展，让邢帮忙找关系。邢之杰不知道杜建超的真实目的，便把他介绍给了在京汉铁路任

伪警备总队参谋长的邢钟宇。邢钟宇是邢之杰的家兄，自然不会对杜建超有任何怀疑。

1948年夏，杜建超来到汉口。坐落在汉口江北岸的京汉铁路机务段聚集了大量的铁路工人。杜建超时常身着便装，深入工人之中，宣讲革命道理，讲我党很快就会取得胜利，讲工人的权利等。之后，一批表现积极、思想坚定的铁路工人被杜建超组织起来。

通过邢钟宇的关系，杜建超结交了京汉铁路汉口地区铁路伪警服务大队副队长高光弟。经过杜建超劝说，高光弟投诚。

国民党武汉当局深知失败已不可避免，加快对铁路设施破坏，并将一部分器材设备转移。杜建超带领工人骨干力量开展护路护车活动，阻止敌人破坏。1948年8月的一天，杜建超从一名工人口中得知，国民党要存放在车站内的数十吨食盐焚毁。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组织工人轮流日夜看护，使国民党的阴谋始末未能得逞。

在组织工人开展护路斗争的同时，杜建超还深入武汉大学，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罢课、游行等活动。杜建超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有效地配合了汉口当地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其他活动，受到了主管领导的肯定。

1949年5月中旬，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长驱直入，浩浩荡荡开进汉口。驻守在武汉三镇的国民党军队，迫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向南撤退。解放军兵不血刃，解放了武汉三镇。而此时，解放军已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国民党军队。全国的解放已是屈指可待。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杜建超又接到新的任务：策反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育长王祖文，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和地面机械维护等技术人员加入我方，为新中国未来空军建设和发展广罗人才。随后，杜建超决定只身前往国民党空军司令部。

由于杜建超没有中间人介绍，也无任何关系可以利用，如果直接去

找王祖文，一旦其翻脸，杜建超必是有去无回。为了建设新中国的需要，杜建超下定决心——即便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上级党组织交付的任务。

王祖文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下，留学德国，学习航空飞行。学成回国后，王祖文加入国民党空军，是国民党空军最优秀的飞行骨干。他曾与飞行勇士孙桐岗，共同驾驶克林姆-32型小型飞机，分段长途飞行大半个中国，宣传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遗训。

王祖文1935年9月任国民党空军上尉。1938年，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陷后，王祖文随国民党空军转移至衡阳。这时，他已升至国民党空军少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育长，掌握大批的技术人员。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在这样的形势下，王祖文颇感迷茫，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变化。

面对杜建超的到来，王祖文似乎看到了希望。杜建超细致、耐心地给王祖文讲当前形势、新中国的前景。数日后，王祖文决定向我军投诚。随后，王祖文和16名思想进步的机修、飞行等专业人员一同奔向解放区。

1949年8月的一天晚上，王祖文等17人来到约定的地点，在杜建超的带领下，向北进发，奔向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武汉。

王祖文一行利用国民党空军的身份，通过了敌人的盘查，终于到达了第四野战军司令部。

第四野战军负责社会部情报的副参谋长肖克会见了他们，对他们弃暗投明的壮举给予了赞许。肖副参谋长特地表扬了杜建超的无惧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王祖文投诚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空军技术人员为我军所用，第四野战军情报部门命令杜建超前往衡阳，策反机场的王场长。由于这个王场长在航校时，和王祖文是同学，王祖文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我方的待遇政策和对技术人员的渴望、尊重，言之灼灼，情深意切。

(下转7版)